

第三卷

康志文集

刘培育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

C53

116

虞愚文集

第三卷

刘培育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1号

虞愚文集

刘培育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3.5 插页9 字数1,030,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

ISBN 7-226-01470-X/I·386 全套 定价: 70.00元



虞愚像

虞 愚 文 集

第三卷 文论·诗论·诗词

目 录

变文与中国文学	(1105)
试论屈原作品	(1115)
杜诗初探	(1140)
第一章 杜甫的时代	(1140)
第二章 杜甫的生平和创作	(1142)
第三章 杜诗的思想与艺术	(1158)
第四章 杜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1212)
诗词	(1222)
自序	(1222)
论诗	(1224)
抒怀诗六十九首	(1225)
悼念诗二十五首	(1256)
酬赠诗八十七首	(1273)
唱和诗五十六首	(1308)
题咏诗三十四首	(1337)
词铭十二首	(1348)

序记	(1355)
《罗雅华诗集》序	(1355)
·太虚法师挽词并序	(1357)
敬念陈嘉庚先生并序	(1361)
《茶叶与健康》序	(1363)
《求字丛集》序	(1364)
后记	(1367)

变文与中国文学*

一、前 言

印度佛教传到中国而史籍有明文记载的，以汉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诏书里提到楚王英奉祀佛陀并供养佛徒为最早。和印度佛教相随而来的天文历法、音乐、绘画、音韵、建筑、医方等等，也莫不丰富了中国人民文化的生活。至于译籍、文物等遗产，更是丰富惊人，早为国际所珍视了。单就汉文学史而论，六朝时代的论辩文和志怪小说，齐梁以来文的骈化和诗的律化，都显然地受着印度的影响。“受佛教影响最深刻的变文”，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结成了难解难分的关系。敦煌千佛洞变文的发见，使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经济史和人民文学史的研究，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史料。变文的发现，始于何时？它的来源和实际功用怎样？它的组合方式和主要内容又是怎样？它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想粗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帝国主义分子盗窃敦煌文物与变文的发现

1879年，帝国主义分子匈牙利地学会会长洛克齐（L. de Loczy）和斯希尼（Szecheny）借口考察地质到甘肃省敦煌县，看到千

*本文原载《现代佛学》1958年第11期，署名“秋乐”。

佛洞壁画壮丽，认为希世之珍，归欧后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那时交通不便，未曾引起文化贩子们的注意。1907年5月，英帝国主义分子匈牙利人斯坦因(S. Aurel Stein)在西北“游历”，知道敦煌千佛洞一个石室中藏有大批的古代钞本，于是串通了千佛洞的道士，盗窃了七千卷运到伦敦，纳之大英博物院；其中有西藏文典籍部分则由大英印度局保管。不久，这消息被法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M. Paul Pelliot)知道了，也偷盗去两千卷，运到巴黎分三处陈列。佛画、佛像陈列于吉麦博物馆，绘画、工艺品、版画、绣帛之类陈列于鲁渥尔博物院中，书籍则保管于国民图书馆中之写本部。“到中国盗宝去”，在欧美文化贩子中成为风气，我国腐朽的满清政府在人民的义愤督促下，将被盗窃剩下的残余部分运归北京，目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有九千多卷，而流传私人手中的，也不下一千卷。合计起来，石室藏书总数，大概有两万多卷。

这些钞本，除了十分之九的佛经和少数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经典，以及经、史、诸子书籍，各种帐籍之外，也有中国失传的文学作品，如从珠玉抄中发现刘知几诗几十首，白行简的发卖禁止之赋也在这里面。长诗有韦庄秦妇吟，歌曲有太子赞、孝子董永、季布歌等，用白话写作的小说则有唐太宗入冥记、搜神记等，这一项珍贵遗产的发现，使我们对古代文化史，特别是宗教史和文学史研究上获得了宝贵的原始资料，而变文的发现则又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有它，宋代话本文学，诸宫调的来历，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才逐渐得到了正确的解答。

三、变文的来源和当时的需要

变文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它的来源和适合于它的时代

的需要。它的来源主要是佛经，它的需要是传教。初期的作品，并没有多大的文学的价值，不过是佛教的宣传品，不过后来这种体裁在民间逐渐流行，作者逐渐改变其宗教的内容，而易以历史故事、民间故事、英雄故事的叙述，这样就渐变为一种民间通俗文学的新形式了。

我们知道，东汉以来，翻译的佛经很多，但在当时文化只是被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同时雕板印刷也还没有发明的情况下，要使佛教深入民间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就逐渐产生一种“唱导”的制度。梁释慧皎高僧传叙述这种制度由来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欲辨一齐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又描写它的效果说：

谈无常则会心形战慄，话地狱则布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闾众倾心，举堂侧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从这两段文，可以看出唱导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宏扬佛教。因为要引起听众的兴趣，不得不“杂序因缘，旁引譬喻”，因为要加强宗教的气氛，又不得不在无常、地狱、昔因、当果、怡乐、哀戚各方面加以文学上的夸张渲染的手法了。

这种宣传方法，到了唐代，更发展为“俗讲”。担任这种俗讲的和尚，名为“俗讲僧”。他们在寺院开讲，叙述各种佛教故事，连说带唱，描摹表演，艺术很高，得到各阶层人民的爱好，

赵璘因话录和段安节乐府杂谈都提到在唐穆宗时代俗讲法师文淑的故事，他的号召力能使“听者填咽寺舍”，他的艺术是“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从俗讲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变文，只限于宣传佛教，到后来史事英雄故事等也都讲起来了，于是变文成为一种民间讲唱的文艺。但在敦煌文库未打开以前，俗讲文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敦煌文库打开后，我们才看见这种讲唱的真面目。这一类的作品，随着在俗讲中不同场合的应用而有缘起、讲经文、押座文（讲经前之催声。此等文学，大约均以数十联韵文构成）等不同的名称，但其中大多数都称为变文。事实上，变文就是俗讲之话本。变文，是指刺取佛经中神通变化故事而敷衍成文，以便作通俗宣传的一种文学上的作品。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说：“既见大圣以神变，普观十方无量土。”凡是用图画显示经中神变之事，称为“变相”，如灵山变、净土变、降魔变，都是变相。而用文字显示经中神变之事，就称为“变文”。或简称为“变”。至于非佛教故事，因其体制相同，所以也归诸变文之列。

四、变文组合的方式和主要内容

中国文学的体裁是单纯的。骈文是骈文，散文是散文。章太炎先生说：

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行，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

矣。

变文作品，既然是一种讲讲唱唱文学，因此采取散文骈文和韵文组合起来的文体，使听的人感到兴趣。组合的方式，大致有下列的三种：

第一、先用散文讲述故事，再用韵文将所述故事重复地歌唱一遍。这样重复的做法，是作者使人易于记忆。象维摩诘经变文持世菩萨卷就是这种样式。

第二、散文只是用作引子，而韵文则用来详加铺叙。这样散文和韵文两部分，不但没有迭床架屋之嫌，而且互相关联，互相帮助，显然是比较合理的方式。象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就是这种样式。

第三、在叙述和描写的时候，散文和韵文交织使用，形成一种不易分割的混合体。象伍子胥变文，就是这种样式。

至于句法方面，散文部分，有很拙劣的白话，也有很通俗的骈文；韵文部分大约可分长偈短偈二种，短偈大抵都是七言八句，近于七言律诗。长偈上章，一律七言，或间用三、三、七言的句法，或选用三、三、七言的句法，特别喜用复句，极反复歌咏之致。至长偈大章句法，或一律七言，或间用三、三、七言的句法，或选用三、三、七言的句法。不过都是用平韵，没有复句。这一切，几乎是后来一切讲唱文学所采取的共同形式。至于象虞舜至孝变文，通篇用六言叙述，那是一种变体，并不是正常的体制。

从现存的变文材料来看，内容可分为佛教故事和非佛教的史事与民间故事两大类。在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中，以“维摩诘经变文”的结构为最宏伟。维摩诘所说经它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经典。三国时即由吴支谦译出，后来鸠摩罗什又重新翻译，文字极优美，罗什的门弟子即为这部经作注疏。这部经主要内

容，近人欧阳竟无先生曾作扼要的介绍：

其事则文殊问疾，维摩显通，须弥得座演不思議法门，香国得食作无文字佛事。大士闻尽无尽法以去，维摩取妙喜世界以来。自始至终无非现通，是故维摩诘经又名不可思議解脱法门经也。

维摩诘经变文的作者，把握住了这部不朽的经典而作为他自己创作的依据，逞其才华，逞其想象力的驰骋，也便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创作。可惜残缺不全，我们无由窥其全豹。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被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第二十卷，才叙到释迦叫持世菩萨去问病。敦煌零拾所载的持世菩萨问疾第二卷，才叙到魔王波旬欲以美女破坏持世的道行。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文殊问疾第一卷才叙到文殊去问病的事。尽管这样，但从局部推测全体，仍然可以认识到它是一篇壮丽的史诗，现在试举持世菩萨中的一段为例，看看变文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经〕云：时魔波旬从万二千天女，状帝释鼓乐弦歌，来诣我所。

这是原经文的一段，以下就是演为变文：

是时也，波旬设计，多排嫫女嫫妃，欲恼圣人。盛装奢华，艳质希奇，魔女一万二千，最异珍珠千般结果，出尘并（菩萨二字简写），不易恼他，持世上人如何得逞。莫不盛装美貌，无非多着婬媚，若见时媛巧出言词，税调者必生退败。其魔女者，一个个如花菡萏，一人人似玉无殊。身柔软兮新下巫山，貌娉婷兮才离仙洞。尽带桃花之脸，皆分柳叶之眉。徐行时若风飒芙蓉，缓步处似水摇莲亚。朱唇旖旎，能赤能红；雪齿齐平，能白能净。轻罗拭体，吐异种之馨香；薄嫩挂身，曳殊常之翠彩。排于坐右，立在宫中。青天之五色云舒，碧沼之千般花发。罕有罕有，奇哉奇哉。空将魔女

烧他，亦恐不能惊动。更请分为数队，各逞逶迤。擎鲜花者殷勤献上，焚异香者备切虔心，合玉指而礼拜重重，出巧语而诈言切切。或擎乐器，或即吟哦，或施窈窕，或即唱歌。休夸越女，莫说曹娥。任伊持世坚心，见了也须退败。大好大好，希哉希哉。如此丽质婵娟，争不妄生动态。自家见了，尚自魂迷；他人见之，定当乱意。任伊修行紧切，税调着必见回头；任伊铁作心肝，见了也须粉碎。……

以下是魔王化作帝释共魔女们鼓乐艳歌从天上下来到持世菩萨之室，极尽文字上夸张之手法。接着是转入七言诗偈，叫做“吟”，又加上间以三七言，叫做“韵”。

[吟]魔王队仗离天宫，欲恼圣人来下界；广设香花中供养，更将音乐及弦歌。清冷空界韵嘈嘈，影乱云中声响亮。胡乱莫能相比并，龟兹不易对量他。逶迤乐引出魔宫，隐隐排于霄汉内，香蒸烟飞和瑞气，花擎撩乱动祥云。琵琶弦上弄春莺，箫笛管中鸣锦凤。扬鼓杖头敲碎玉，秦筝丝上落珠珍，各装美貌逞逶迤，尽出玉颜夸艳态。个个尽如花乱发，人人皆似月娥飞。从天降下闭乾坤，出彼宫中遮宇宙。乍见人人魂胆碎，初观个个尽心惊。

[韵]波旬是日出天来，乐乱清霄碧落排。玉女貌如花艳折，仙娥体是月空开。天挑强逞魔菩萨，美质徒夸恼圣怀。鼓乐弦歌千万队，相随捧拥竞徘徊。夸艳质，逞身才，窈窕如花向日开。十指纤纤如削玉，双眉隐隐似刀裁。擎乐器，又吹嘘，宛转云头渐下来。……

经中原文仅有二十一个字，可是当时俗讲僧将它扩充成一千多字的变文成为这样佛魔斗争有声有色富丽生动的创作，其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惊人的，这正是受佛典翻译文学影响的结果。我们知道：印度古代学者是极善于静坐冥想，产生另一种神秘天地，

所以佛教文学的作品，也最富于想象力。他们的脑海不知道有多少世界，有多少有情，动不动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他们富于冥想，表现在创作力上，一写就是几十卷几万字的长诗，这一种文学的输入，对于一向偏重于现实世界观的中国作家来说，在扩大思想领域方面的启发作用是相当大的。

关于佛教故事的变文，除上述最宏大的“维摩诘经变文”以外，还有“阿弥陀经变文”、“妙法莲华经变文”、“父母恩重经变文”、“譬喻经变文”、“八相成道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诸种，这里就不再举例了。大概这些演说佛教故事的变文，在民间普遍流行，于是有人依其组合方式，易以非佛教的史事与民间故事的变文。甚至把当时的民族英雄张义潮（刘复拟名为西征记，见敦煌缀琐）、张维深的事迹也编成变文来讲唱，这自然是适应群众的要求。人民在当时，一面虽然有宗教信仰，但另一方面也有文艺的爱好，并且希望在俗讲中能听到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这就是说，俗讲最初虽然是佛教的宣传方法方式，但它形成一种俗讲文艺之后，就不能随群众的爱好为转移，在内容方面是多样化，在描摹表演方面，更是通俗化了。如伍子胥的壮烈，王昭君的哀怨故事，都是最受当时群众欢迎的，也尽入于俗讲僧的变文中去了。这里必须指出，俗讲文学体裁确立之后，民间自由运用，内容不断扩充，为当时人民所喜爱，因而描摹表演的机会就非常地多了，所以后来的变文，不仅由男子讲唱，也由女子讲唱了。全唐诗中吉师老有看蜀转昭君变一诗：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滨。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清词堪叹九秋文”，可见讲唱者持有话本；“画卷开时塞外

云”，可见讲唱的时候又有图画作辅助品。巴黎藏伯字四五二号
为“降魔变文”。述舍利弗征服六师外道故事中的“劳度叉斗
圣”一段。卷子背面有图画，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这不但可以
给吉师老诗作注脚，同时也证明讲唱之时展开图画作辅助是真实
的情况了。•

五、变文对于后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影响，这是郑振铎先生早在
“中国俗文学史”中肯定过的。他说：“在变文没有发展以前，我
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
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
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
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
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
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从这些话，变文如何影响于
后代中国文学已不难想见了。实际，从宋人话本、鼓子词、诸宫
调、宝卷、弹词、戏曲、小说各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变文在中国
文学史上所发生的深厚的影响。总之，变文是近几十年才发现的
重要文献，有了它，在中国和西域中古史的研究增加了可贵的史
料；有了它，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有了
它，在祖国文学的园地中提供了一个可以使用较长的篇幅来容纳
丰富的想像力和创作力的可能性。变文初期的作品是为佛教服务
的。但当它在民间普遍流行，作家们就依其样式，采取一些能够
体现人民的思想感情的题材来从事创作，于是写历史故事的变
文，写民间故事的变文，写当时的英雄故事的变文，就应运而
生，并影响到宋人话本直至戏曲、小说各方面，也正因为这样，

才成为中国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就是说：变文产生于佛教的宣传，但终于摆脱了佛教故事的范围而扩充非佛教故事范围，发展成为后来讲唱文学的样式。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教故事的变文是变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角度看，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倒是主要的。里面有继承的东西，也有发展新生的东西，我们正需要用辩证方法从普遍联系来理解它，从变化发展来理解它了。

本文参考资料：

章太炎：《文学略说》

欧阳竟无：《藏要二辑叙——维摩诘所说经》

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

试论屈原作品*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过去无论在怎样黑暗的统治下，他的作品都一直在受着人们的尊重；现在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他的作品当然更要放射出万丈光芒了。一九五三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的四大文化巨人，屈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充分说明了他的作品已经是属于全人类的。屈原的人格到底是怎样的？稍为读过他的代表作《离骚》的人，都可以看到一点轮廓。但他的作品在思想方面，进步性在那里？局限性又在那里？在艺术方面，创造性在那里？特殊的风格又在那里？在总的方面，他的作品有那些成就？对以后的文学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想初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先谈思想方面的进步性：

（一）富有人民性——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是文学史上重要问题之一。资产阶级文学史，从来不曾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过去同现在、看社会与文学，总以个人为出发点，以为个人在历史过程当中，在文化与文明发展当中都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以个人为出发点，当然不可能提出人民性问题。《联共党史》指出：“历史的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之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之行动，归结为

*本文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5期。